

荀子

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李德永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荀子

公元前三世紀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李德永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荀子

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李德永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3 3/4 捷頁 2 字数 70,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2074·193

定 价：(八) 0.34 元

封面设计：任 意

目 录

一、荀子的时代.....	1
二、荀子的世界观.....	13
三、荀子的認識論.....	28
四、荀子的邏輯思想.....	47
五、荀子的人性論.....	67
六、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85
結 論.....	113

一、荀子的时代

荀子姓荀、名况、字卿，世称荀况、荀卿或孙卿（古代荀、孙二字同音）。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省安泽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各家意见不一，尚难确定。但从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看来，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赵惠文王元年）——前238年（赵悼襄王七年）之间（据汪中《荀卿子年表》）。这时正当我国奴隶制社会即将告终、封建大一统局面即将形成的前夜。

荀子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先秦时代同孟子齐名的儒家大师，是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学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又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政治活动家。他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大变动时代里，曾经游学于齐、访问于秦、议兵于赵、最后依春申君为兰陵令，老死于楚。他一生讲学议政的目的，就是要依靠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实现儒家用王道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

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和自然科学日益发展的理论概括，也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各种优秀学术成果的批判

性的总结。因此要了解他的思想的丰富内容，一方面要了解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一方面还要了解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

現在首先介紹战国末期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張。

战国末期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日益开展的时期，也是各大国之間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的时期。当时各国以厉行耕战、力图富强为目的的变法运动，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旧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因而出現了以新兴地主势力占支配地位的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另一方面则由于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又加剧了各大国之間的兼并战争；而兼并战争的历史趋向，则是由一个强国来统一中国，以便最后结束旧贵族政权遗留下来的分裂割据状态，建立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新政权。这就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轉变时期政治斗争的发展規律。

但是当时各新兴国家的实力是不平衡的，它们在兼并战争中的或胜或负，也是經常变化的。例如，齐湣王兼并了宋国，又被魏国夺去；燕国兼并了齐国，又被田单夺去；赵国兼并了韩国的上党郡，又被秦国夺去；即使是变法最为彻底、国力最为强大的秦国，虽然兼并了很多土地，具备了统一中国的条件，但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輒已”。根据这些情况的实际考察，荀子得出了一个結論：“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①这就是說，当时各国要夺取统一中国的

领导权，不但要解决兼并战争中的胜负問題，还要解决如何保持和巩固胜利成果这个更重要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构成了荀子王道思想的出发点。

荀子根据“坚凝”的观点，对于统一中国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較。一种方式是“以德兼人”的王道，就是用一套緩和的惠民政策来爭取各国人民的归順和支持。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他认为这是一种既能兼并又能“坚凝”的最稳当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以力兼人”的霸道，就是专门依靠軍事力量来威懾人民、侵略弱小国家，这是当时各强国普遍采用的方式。他认为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得地而权弥輕，兼人而兵愈弱”，所以只能兼并而不能“坚凝”。最后还有一种“以富兼人”的新方式，这是某些缺乏軍事实力的国家采用的方式，它們专门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来收买与国、誘取人民。他认为这种方式虽能成功于一时，但其后果是“得地而权弥輕，兼人而国愈貧”，因此这是一种既不能兼并又不能“坚凝”的方式。^②

荀子对这三种兼人方式的分析和比較，不但是儒家王道思想的發揮，同时也是他对于战国末期政治斗争情况实际考察的結果。我們可以从他在齐、秦、赵三国所发表的言論中得到更具体的了解。

当齐湣王用孟尝君为相时，荀子正在齐国讲学。当时的齐国，“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郤墮秦，五国宾从，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③兼并之功，超过了秦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权謀变詐的兼并方式，既內

失民心，又外树敌国，是非常不巩固的，只要一国发动反齐；兼并的土地马上就会丧失。所以他力劝孟尝君改变政策，不要迷醉于“胜人之势”，而要致力于“胜人之道”，使各国的“賢士”、“能士”和“好利之民”自然归顺于齐，这才是“一天下”的最稳妥的办法。^④但是孟尝君和齐湣王都没有接受他的意见，终于公元前284年（湣王四十年）为燕、秦、赵、魏、韩等国的联合反攻所败。

齐国的兼并战争失败以后，秦国的势力日益强大。荀子认为当时唯一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的，只有秦国。因此他于公元前266年前后（秦昭王四十一年拜范雎为相后）毅然打破过去“儒者不入秦”的惯例，亲自到秦国去访问。当范雎问他“入秦何见”时，他发表了自己的观感：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儉教敬忠信而不苟，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闻，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⑤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秦国外除了地形险要、物产丰富等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朝野上下的奉公守法精神。这与齐国“女主乱之宫，詐臣乱之朝，貪吏乱之官，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夺为俗”^⑥的分崩离析状况完全不同。但

是他认为秦国也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对老百姓的統治办法太苛刻。关于这点，他在范睢面前只用“甚畏有司而順”一句話輕輕带过去了。但到他回到赵国討論軍事問題时，他对赵孝成王說：“秦人其生民也陷隱（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隕，恆之以庆賞，餚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⑦这是一套严刑峻法的統治政策，和儒家傳統的惠民政策完全不同。此外，秦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无儒”，秦昭王就根本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为此在昭王面前把儒者的作用大大地宣傳了一番。他认为儒者不但能“通乎財万物养百姓之經紀”，因而在管理內政和經濟上并不比法家差；而且在統一中国的大問題上，还能够做到“近者歌謳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⑧这种政治眼光不知道比法家要远大多少倍。但是以法家立国的秦国始終未采用他的意見。

荀子离秦后回到赵国，在赵孝成王前和临武君討論軍事問題（公元前 265 年，即赵孝成王元年），这是当时兼并战争中最現實的問題。他从“兵要”、“兵設”、“为将”、“軍制”及用兵原因等問題一直談到兼并和“坚凝”的根本性問題。他认为在軍事問題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械用兵革”和权謀变詐，而是人民的趋向；用兵的目的不是为了爭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如果兼并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即使是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銳士”，最后还是要失敗。所以他的結論是：“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

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⑨这可以說是儒家王道思想在軍事問題上的卓越見解。

从荀子的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認識：

第一，荀子的王道思想和他的學生韓非的霸道思想不同。韓非是主張“以力兼人”的。他认为戰國末期是“爭于氣力”的時代：“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故明君務力”。⑩只要實力強大，就能夠“攻人”，就能夠得天下。因此他根本反對“以德服人”。荀子並未完全否認“以力兼人”的作用，但他所講的“力”除了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外，更重要的还是指的民力：“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讐者榮”。⑪只有得到人民的自動支持，國家才能真正富強，在兼并戰爭中才能樹立威信，勝利的成果才能“堅凝”。所以“凝其德”是“全其力”的根本條件。否則，光用強力，傷民太甚，就會“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⑫最後還是要失敗。以後秦國的用法家而早亡以及漢代的“崇儒術”而維持得比較長遠，都證明荀子的王道路綫比韓非的霸道路綫來得高明。

第二，同是主張用王道統一中國，但孟子是理想主義者，荀子是現實主義者。孟子感於兼并戰爭的殘酷，主張“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⑬既要實現統一中國的理想，而又完全反對兼并戰爭、反對聯合與國、反對富國強兵。這個理想就成了空想。荀子雖然反對“以力兼人”、“以富兼人”，但他並未反對兼并戰爭，也不忽視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兼并戰爭中的作用。他的王

道路綫是“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⑭也就是用文治兼武功的办法來实行統一。因此就這方面来讲，荀子是一位以儒家王道思想為主體同時又具有法家霸道思想傾向的政論家。

現在簡單介紹一下戰國末期的經濟情況。

這個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由於冶鐵技術的改善，鐵制工具已普遍應用於農業、手工業和水利灌溉事業。手工業所製造的耒、耜、鋤、鎌、鐸、鋒等已成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工具。其中以耜、鐸兩種工具最為重要。據說，耜的柄長6尺，刃廣8寸，能夠翻松田間土塊。耨的柄長1尺，刃廣6寸，能夠除去田間野草。有了這兩種工具，就可以做到“苗堅而地隙”，“地肥而土緩”。^⑮在水利方面，已能够用鋒利的工具來挖掘泥土和凿平岩石。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修築了有名的都江堰，既免除了泛濫的水災，又便利了航運和灌溉。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前修築了鄭國渠，長約3,000多里，能够灌溉田畝40,000多頃，使關中一帶再無凶年。^⑯由於農業生產工具的改善以及水利灌溉事業的應用於農業，農業的生產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據說，南方的稻一畝能够收到數盆（量名），一年能够收到兩次。此外，“瓜桃枣李”、“葷菜百蔬”、“六畜禽兽”、“鼈鼈魚鼈鮑鱠”等副業生產也很發達。^⑰同時，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由於水陸交通的發達，商業也顯得非常發展。荀子對於當時商品交換的情況是這樣形容的：“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

而中国得而財之。东海則有紫絳魚鹽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农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⑩ 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現了許多繁華的商业城市和有名的商人。因此，战国末期是社会經濟空前繁荣的时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富兼人”的新兴地主国家。

社会經濟的繁榮也带来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时的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并且出現了专门的农学家和农书。例如，“尚书、禹貢”記載了不同土壤的分布状况，“周礼、草人”記載了改造土壤的“土化之法”，“管子、地員”詳細地辨別了土壤的种类，特別是“呂氏春秋”的四篇农业論文，对于农业政策和农业技术作了詳細的說明。其中“辨土”篇对于庄稼的播种作了比較深刻的研究，“审时”篇更从农作物的生长、收获和品味三方面來說明掌握耕作季节的重要性。此外，当时的医学也很发展。人們对于身体构造和生理卫生已进行研究；医生已經分科，著名的民間医生扁鵲就曾在各地做过带下医（妇科医生）、耳目瘡医（耳目科医生）和小儿医（小儿科医生）。当时由于农业发展的需要，天文学已很发展，出現了許多觀測星辰运行的占星家。例如，齐国有甘德，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臯，魏国有石申。石申編制了包括 800 个星的恒星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当时人們已企图利用这些天文学的成就来掌握同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年成好坏的規律。“呂氏春

秋”的“十二紀”就根据这些規律安排統治者周年四季的施政历程；当时的大商人如范蠡、白圭等更企图利用这些規律来預測年成的好坏，以便在商业投机活动中取得暴利。^⑯由此可知，当时的自然科学已被人們运用到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里面来了。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自然科学的日益发展，人們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然变化的某些規律；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才有可能施展“辟草萊，任土地”的主动能力；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才有可能出現一个唯物主义思想的高潮；荀子“制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物理可知”的认识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出来的。沒有这个基础，“天論”、“解蔽”、“富国”这些富有科学性和战斗性的文章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可以这样毫不夸大的說，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战国末期經濟繁荣和科学发展的里程碑。

最后我們介紹一下战国末期的学术思想情况。

战国末期在政治上的“七雄斗争”，反映到学术思想上便是“百家爭鳴”。齐国“稷下学宮”是当时各种学派荟萃的中心，也是学术思想斗争最激烈的地方。齐国的統治者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曾經招募当时各国的賢士和宾客，为他們“开第康庄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⑰当时在这里讲学的，有阴阳家（騶衍、騶奭）、道家（田駢、慎到、环渊、接子、宋钘、尹文）、名家等学派。他們在这里不仅能够自由地讲学，而且能够自由地議政（各著书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荀子所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正說明当时各个学派爭論

学术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热烈情况和民主风气。“稷下学宮”的設置，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当时思想的大解放，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據說当孟子做齐国的客卿时，荀子就以一个 15 岁的俊秀少年在这里学习了。当时在这里学习和讲学的，“且數万人”。齐湣王的兼并战争失敗后，学士各分散，荀卿曾去齐适楚。到齐襄王复国时恢复学宮，他又回到齐国，并且成了学宮的老前辈（“最为老师”）。由此可知，他在学宮讲学的时间最久，受到各个学派的影响当然也最深。

荀子是我国古代思想的綜合者和批判者。他既身为学宮領袖（祭酒），又当学术昌盛之时，所以对于諸子学說，他的批判就更为中肯，綜合就更为全面。在战国末期，“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和“解蔽”篇、“韓非子”的“显学”篇以及“呂氏春秋”的“不二”篇，都具有批判和綜合諸子学說的思想傾向。但庄子对“百家往而不反”的局面抱悲观的态度；@ 韓非根本反对“藏书策、习談論、聚徒役、服文学而議說”；@ “呂氏春秋”則是对于諸子学說采取“齐万不同”的揉合态度；@ 只有荀子的批判态度才是比較科学的。他一方面固然坚持儒家的立場，对于老子、庄子、申子、环渊、慎到、田駢、季真、魏牟、惠施、邓析、宋钘、墨翟、陈仲、史鰌，都进行了批判，說他們都有所“蔽”。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抱着虛心学习的态度，說他們又都有所“見”，不隨便抹煞別人的成績。他特別反对那种在学术問題上“私其所积，唯恐聞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聞其美也”的宗派

主义态度。^⑭即使是儒家的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都被他斥为“賤儒”、“俗儒”或“沟犹瞀儒”，而对于子思、孟軻更不惜痛加批判。他只推崇孔子和子弓，而他推崇他們的原因則是由于他們能够“总方略、齐言行，壹統类”，^⑮这与諸子的“一曲”之見当然不同。

正是由于他采取了科学的批判态度，才使他的思想具有較高的綜合性，諸子學說的精华才能被他合理地吸收。例如：在天道問題上，他批判了道家消极无为和神秘主义的观点，但又吸收了他們的“自然”观点，因而为他的“制天命”思想建立了科学的理論基础。在認識論上，他批判了各家“蔽于此而不知彼”的主观片面性，但又吸收了各家思想的合理因素，为他的“解蔽”思想和“物理可知”論丰富了內容。在政治思想上，他批判了“法、术、勢”的法家思想，但又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合理因素，提出了“生礼义而起法度”的观点，因而使儒家的礼义學說，得到了修正和新的补充。总之，他是在发展儒家中吸取了百家，又在吸取百家中批判并綜合了百家。經過他的批判和綜合，先秦諸子的优秀学术成果就使我們研究起来感到更为集中和鮮明了。

荀子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师承关系来看，他是儒家子弓的私淑弟子；在稷下学宮学习时，也可能做过道家宋钘的学生；他的弟子韓非和李斯都是当时法家有名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并且他們都从思想和行动上直接帮助秦始皇統一中国；據說荀子死后，他的門徒們“著书布天下”。和我国古代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儒家經典如

“詩”、“書”、“易”、“禮”以及“春秋”的傳授系統，無論直接或間接，都和他有關係。從他的思想價值來看，由於他吸取並總結了戰國末期自然科學和百家學說的積極成果，這就使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思想在同唯心主義思想的鬥爭中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他的哲學思想的積極因素曾被歷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用来作为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他的政治思想，在积极方面曾被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用来作为反对貴族势力的有力工具，在消极方面則被歷代的封建統治者用来作为統治劳动人民的理論依据。

- ① “荀子：議兵”
- ② “荀子：議兵”
- ③ “鹽鐵論：論儒”
- ④ “荀子：强国”
- ⑤ “荀子：强国”
- ⑥ “荀子：强国”
- ⑦ “荀子：議兵”
- ⑧ “荀子：儒效”
- ⑨ “荀子：議兵”
- ⑩ “韓非子：顯學”
- ⑪ “荀子：王霸”
- ⑫ “荀子：王制”
- ⑬ “孟子：萬世上”
- ⑭ “荀子：王制”
- ⑮ “呂氏春秋：任地”
- ⑯ “史記：河渠書”
- ⑰ “荀子：富國”
- ⑱ “荀子：王制”
- ⑲ “史記：貨殖列傳”
- ⑳ “史記：孟荀列傳”
- ㉑ “莊子：天下”
- ㉒ “韓非子：顯學”
- ㉓ “呂氏春秋：不二”
- ㉔ “荀子：解蔽”
- ㉕ “荀子：非十二子”

二、荀子的世界觀

在未談荀子世界观的中心問題前，首先談一下他关于世界起源問題的見解。对于这个問題，他的基本論点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①即是从自然界本身來說明万物形成和变化的原因。这个論点当然是儒家“周易”思想的继承；但在具体說明这一問題时，他还吸取了当时思想界关于“气”的学說，把气看成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因素。他說：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貴也”。②

从这段話中，我們可以得到两点認識：第一，他試圖从性质上对自然界的物质現象予以种类的区别。他认为水火是有气的，而沒有生命；草木是有气有生的，而沒有知觉；禽兽是有气有生有知的，而沒有道德意識和社会生活；人有气有生有知而又有道德意識和社会生活，所以是最有价值的。第二，他认为这些物质現象虽有生命、知觉、道德意識和社会生活的区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物质因素——“气”。因此，他自发地猜測到事物的多样性統一于物质性这个重要的原理。他的这些論点虽是朴素的，但含有科学的因素，同